

CULTURE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秦汉文化史

张其成 著



韩养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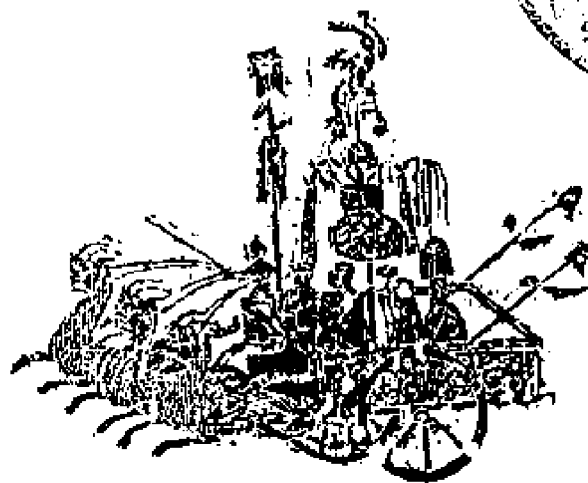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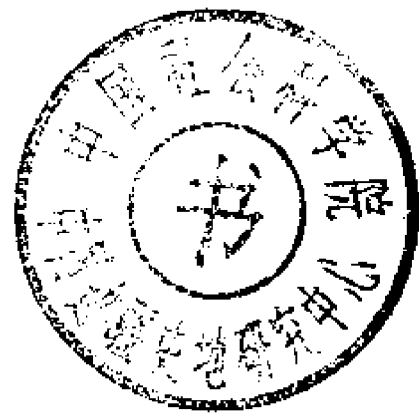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K232

秦汉文化史

韩养民 著



0803070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秦汉文化史

韩养民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插页：4 198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387·1

定价：3.75元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代序）	(1)
第二章	教育与经学	(15)
	一、文化教育政策	(15)
	二、太学与经学	(19)
	三、官邸学与鸿都门学	(37)
	四、郡国学校	(41)
	五、私学	(45)
第三章	哲学	(54)
	一、百家争鸣的余波	(54)
	二、先秦诸子学说的扬弃与发展	(61)
	三、离经叛道者的崛起	(65)
第四章	宗教	(73)
	一、多神教与神仙术	(73)
	二、原始道教的形成	(79)
	三、佛教的东来	(86)
第五章	风俗	(93)
	一、服 饰	(93)
	二、饮 食	(104)
	三、葬 俗	(113)
	四、节 俗	(118)
	五、婚 俗	(132)
	六、礼 俗	(139)
第六章	杂技艺术	(148)
	一、起源和定形	(148)

二、秦汉时期的杂技艺术·····	(161)
三、斑斓多彩的杂技世界·····	(181)
第七章 乐舞 ·····	(199)
一、秦汉乐舞发展概说·····	(199)
二、乐舞伎和乐律家·····	(209)
三、乐舞节目·····	(213)
第八章 美术 ·····	(226)
一、建筑艺术·····	(226)
二、绘画·····	(233)
三、雕塑·····	(240)
四、画像石、画像砖·····	(248)
第九章 体育 ·····	(253)
一、足球·····	(253)
二、击剑·····	(257)
三、射箭·····	(260)
四、摔跤·····	(263)
五、赛马·····	(266)
六、六博·····	(268)
七、围棋·····	(271)
八、弹棋·····	(274)
九、投壶·····	(275)
十、导引·····	(277)
第十章 中西文化交流 ·····	(281)
一、与东邻的文化交流·····	(281)
二、与南方各国的交往·····	(285)
三、与西域的文化交流·····	(287)
附录 秦汉文化大事年表 ·····	(302)
后记 ·····	(314)
图片部分	

第一章 导 论（代序）

我们伟大祖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我们中华民族，以灿烂在古代物质文明著称于世，同时又是一个有高度精神文明的伟大民族。在源流深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各族人民的祖先，不但善于创造、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特有经济、文化，而且善于吸收和融合外来的先进经济、文化。远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交通阻塞，各部落、民族之间囿于一个狭窄的天地，分别创造着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各部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十分缓慢，规模很小；而且，有着强烈的地域性。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多源的特点。当历史进入文明时代，随着“邦畿千里”的夏、商、周三代统一王朝的建立，生产力提高，交通日渐发达，各民族间经济交流日多，相近的生产方式和物质生活条件，必然突破民族或地方的狭隘性，出现相对统一的文化。

夏、商、周三代千余年间的统一，使当时的各族间有一个同属一系统的文字，礼乐制度和近似的风俗习惯。这是秦汉时期文化大融合的先决条件。

及至春秋时期，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诸侯割据，原来的礼乐制度破坏，语言文字中的方音、方言、风俗习惯的差距愈来愈大。到春秋中期之后，由于生产的发展，奴隶逐渐被解放，使经济交流日益活跃起来。这股逐渐形成的经济洪流，冲垮了“横亘中原”、“天限南北”的自然障壁，把南北东西之间的关系沟通起来，把西边的秦和南方的楚联系起来。如郑国的商人，南达

楚，北至晋，东至齐，足迹遍黄河、长江流域。越国大夫范蠡弃官经商于定陶。楚国的杞、梓、皮革，源源不断地运往晋国，出现了“楚虽有材，晋实用之”（《左传》襄公廿六年）的谚语。通过商品的交换，促进了文化的交流，逐渐形成了下列七个文化圈：即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圈、长江下游、淮水流域的吴越文化圈、黄河下游的齐鲁文化圈、黄河中游的中原文化圈、中原北面（包括赵国北部、中山国、燕国等）的北方文化圈、西南的巴蜀滇文化圈以及陕甘的秦文化圈^①。这七个文化圈，各自都有本身的特色，但特色比较显著、影响颇大的则是楚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和秦文化。自春秋时代起，楚人饮马黄河，问鼎中原，与齐晋争雄，楚文化亦随之向北延伸。到了春秋战国之际，楚向东、西拓境，东至吴、越，势力及于淮河流域，与齐、鲁相接；北至汉中，与秦相接。楚文化影响所及达半个中国。

在黄河下游的齐鲁文化的影响也十分显著。齐鲁地区严格地说有两个中心，由鲁国向西与子姓宋国相连的地区，是一个中心，在这里降生了两个为后人称颂的大师——孔子、墨子。如果说孔子给春秋时代以光彩的结束，那么墨子则给战国时代以光彩的开端，于是这里成为儒、墨显学的故乡。另一个中心则是以齐国为中心向北与燕地相连的地区，在战国后期形成了以阴阳五行与神仙怪异相结合的独特文化。同时，由于齐威王、宣王至襄王尊崇文学、招揽游说之士，使齐国成为一时学者荟萃的中心。田骈的“均齐”论、环渊的“贵清”论、宋钲的“形名”说、邹衍的“五德终始”说，都在这里展开争鸣，从而使齐文化富于综合的色彩。

地处黄河中游的中原文化，虽然没有齐国稷下那样激烈争鸣的讲坛，但它长期是华夏族文化的中心，又是兼并战争、游说之士外交活动的中心。“朝秦暮楚”的纵横家、“刻薄寡恩”的刑

^①参见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一章《导论》。

名之学就在这里生根、发芽、壮大。

至于秦文化，那是在周文化的母体中，注入了戎狄之俗而孕育的具有独特风貌的文化体系。秦国高度的集权、缺乏严格宗法观念，秦人犷野矫健的性格、尚武的习俗，都是这个混血儿在成长过程所显示出的独有特征。随着秦人势力的雄长，秦文化日益传布，影响日见显著。

这些区域性的文化，互相影响，互相辉映，彼此吸收，逐步融合。随着中国政治统一大业的完成，共同缔造了光照千秋的秦汉文化。因此，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割据，七国争雄，长期的分裂局面，造成了秦汉文化具有多源性的特点。然而，多源的秦汉文化与三代文化的多源，不是简单的重复，更不是三代文化的回光反照，而是地域范围更加扩大，体制、风貌上更成熟，内容上更充实丰富，走向新的发展道路。

二

秦文化虽然是在周文化的母体中形成的胚胎，也经历了母亲分娩婴儿那样的阵阵痛楚和艰难的过程，但并不是孤立的，它与楚文化之间决非“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是早有瓜葛。战国时期，秦、楚之间交往比较频繁，史称“昆弟之国”（《战国策·齐策一》）。两国间常常通过今日陕西东南地区相互交往。秦昭王灭蜀后，又进一步通过三峡相互传递经济、文化的信息。两国间度量衡基本接近，便可以说是这种长期交流的结果。楚国手工业工艺与艺术水平相当高，特别是漆器工艺尤为显著。近年江陵、云梦等地出土的漆器，造型独特精巧，线条细致流畅，雕刻各种形象，生动逼真。漆地均匀牢固至今鲜艳夺目。最初，秦国漆器比较落后，秦取郢后，漆器逐渐发展起来，云梦等地秦墓中的漆器，绝大部分是咸阳制造。俞伟超同志推测：“很可能秦人取郢后，俘获了一些楚国漆工，故很快发展了

自己的漆器工艺”（《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载《楚文化新探》）。这个推测不无道理。

“楚人信鬼”（《吕氏春秋·异宝篇》），这一风俗也影响到秦人。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的秦主，并非楚地土著，但他死时（公元前217年）却在棺里放置秦简《日书》甲种和乙种。《日书》甲种和乙种，是选择吉凶的书，这实际是楚国传统信仰的体现，反映了楚人崇尚巫鬼的风俗。由此可见，楚人信鬼的思想，对秦人也产生了相当深的影响。乡俗是人民中传统文化的体现，它表明了占领楚地的秦人，也不能不受楚文化的浸润影响。至于秦代写本《篆书阴阳五行》中，文字含有大量楚国古文的成份，更能证明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征服者并不一定把被征服者的文化彻底摧毁，而很可能变为被征服者。自然不是秦国在文化上后来成为被征服者。但秦文化受楚文化影响应是毫无疑问的。

秦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与楚文化有瓜葛，而且与中原文化、齐鲁文化早已通了婚姻的。

中原文化经历夏、商、周三代，逐渐在黄河中、下游孕育而成，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礼乐制度都先进于秦、楚地区。作为在周文化母体中成长起来的秦文化，更容易接受其影响。当秦人称霸于西戎之时，曾以深通“诗书礼乐”自居。《尚书》中的《秦誓》、《诗经》中的《秦风》，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内容容量，或者是朴素、质直的风格，与东方文明发达较早的诸侯国相差无几。究其原因？受中原文化影响应是因素之一。

当战国的历史帷幕拉开之后不久，东方诸国，诸子争鸣，百家立异，学术繁荣，群星灿烂。然而秦国的学术界，却一片寂静。所以战国初期的秦国被各诸侯国歧视，以“夷翟遇之”（《史记·秦本纪》）。东方诸子学说姗姗来迟，使秦国成为文化落伍之邦，在“七雄”中算是最不“雄”的一国。公元前361年，少年新君孝公继位，才独辟蹊径，下诏求贤，决心改变秦国的现状。

卫国贵族少年公孙鞅，闻求贤令，挟着李悝的《法经》，拖着儒生的尾巴，来到秦国，力佐孝公图强。法家学说移植在戎狄之俗的秦国土壤里，开始发芽、成长，一花独放。之后，墨家巨子腹䵍，趁机尾随而入；儒家大师荀子，也曾兴致勃勃游秦，受到礼遇。尽管墨家、儒家学说，在秦国只不过是两朵不结实的花，不久，三晋的宾客集于吕氏门下，“兼儒墨，合名法”，综合百家九流之长，畅谈天地人物的《吕氏春秋》却闻于世。为秦的统一探索新的理论，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大总结，作为秦文化融合的一座里程碑载入光辉的史册。

但也应看到，文化的融合并不尽是在温情脉脉的牧歌声中进行，她经常伴随着刀光剑影、血与火的战争，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战国时期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兼并战争就是这种野蛮的手段之一，因而频繁的战事便是文化大融合的催化剂。韩非的《孤愤》、《五蠹》传入秦国，它那精辟的分析，极端化的言论，竟使秦始皇赞叹不已，喟然兴叹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韩非列传》）。这倾慕是何等殷切！他不惜采取发动战争，将韩非逼到秦国。通过这种血与火的威力，为文化融合开辟通路。在战争中融合，融合中有战争，这是常见的历史现象。

我们也应当看到，不仅中原的法家学说使秦人赞叹，而且东方优秀的乐器、悦耳的音乐，也曾使秦人为之倾倒。正如李斯说：秦人“奔叩缶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谏逐客书》）。从此，曾陶冶了秦人风尚的古朴的秦声——缶，便从国君的酒宴中悄然离去，从士大夫的家宴中消失，流传于民间。昔日孔夫子所痛恨的淫乐——郑卫之音，如今成了秦国乐坛上的宠儿。虽然这仅仅只是几支轻曼舒缓、悦耳动听的曲子，也反映出文化合流的波涛。

从上面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出秦文化在发展中始终与中原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不断保持交流影响的密切关系，从中吸取了

丰富的营养，有力地促进了自身的成长，从而形成了它的多源性的特点。随着秦统一航程的一帆风顺，最后削平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大帝国，实现了几个世纪以来人民所追求的大一统的目标。

文化的融合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国家的统一，又加速了文化的融合。秦统一后的文化仍然是兼容并收，融合各地之长。你看，中原的法家学说已移植于秦；齐人邹衍创立的“五德终始说”，已博得秦始皇的喝彩，第一次被秦朝实行，渗透到政治措施、典章制度中去。秦始皇得意一时的行封禅礼，也非秦国的传统文化，而来自齐鲁儒士的学说。

正因为秦朝文化是多源的，它留给后人的文化产物，不只是毛骨悚然的法律条文，还有值得称道的建筑艺术、雕塑艺术。秦始皇为了尽情享受，大兴土木，使秦代的建筑艺术达到了空前发展的地步。以规模巨大的群体建筑为特征的秦代建筑，被楚人一炬，变为焦土，成为历史的陈迹。可喜的是，被发掘的咸阳“一号”宫殿遗址，其规模宏大、气势雄浑，对称排列，立体宫室周围殿阁环绕，层层叠叠如众星拱月，各殿之间飞阁复道相连。如果追溯它的艺术起源，自然是六国宫殿的艺术再现于咸阳北阪。

至于秦始皇陵东侧的兵马俑、西侧的铜车马，一破土而出，就立即轰动了世界，多少中外来宾为之倾倒，交口称誉。你看那形体高大的陶俑，有的身着铠甲，威武严肃，颇象关西大汉；有的神态清秀，颇象江南武士；有的眼眶深凹，鼻梁高隆，两腮短髭，颇似匈奴人的形象。你看光灿灿的铜车，昂颈挺胸的骊马，迎风飞扬的鬃毛、斜耸的马耳，似在注意主人的号令。穹窿似的车盖和丝丝缕缕的云气图案。看到这使人惊叹不已的壮观场面，不由得浮想联翩。当年来自全国各地，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能工巧匠，他们在秦吏的皮鞭驱逐下，带着本地区的文化艺术，聚集在这里，用自己血汗和智慧建造了不朽的艺术宝塔。先秦文化融成的结晶在这里具体地物化了。不过，物化的具体实物

决不是秦帝国文化的全部，更不是先秦文化融合的全部，仅仅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一部分而已。

按理说，国家的统一，六国文化的汇聚，“车同轨、书同文”政策的推行，应带来学术的繁荣，文化的昌盛。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秦帝国昙花一现的十五年中，并未能创造更可观的文化成果。它的文学园地几乎没有开发，李斯虽然写过一篇《谏逐客书》，负有盛名，却是统一之前命笔的。也许在荒凉的文学艺苑中，曾有过几朵鲜艳的花枝，然而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早已烟消云散了。原因何在？关键在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推行极端专制主义造成的恶果！一把焚书的烈火给后代留下千古叹恨的文化浩劫，一个坑儒谷窒息了一代本来应该活跃的艺术空气，“偶语诗书者弃市”的重压怎会有战国时代那些思想家纵笔挥洒的气概！虽然有一些不甘寂寞的学者、思想家，也曾把目光由注视历史转移到现实中来，可是在强权专制的思想禁锢下，郁郁不得志，只能做“备员而弗用”的博士，感叹自己逢时不祥。更大的思想文化的融合，这个任务只好留给汉代去完成。所以秦朝在思想学术方面远远赶不上艺术文化的发展进程，因而有举世闻名的秦始皇兵马俑，却没有一篇传世的文学佳作。

三

秦始皇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没有给秦文化的发展带来福音，反而使阶级矛盾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终于在陈胜、吴广大起义的浪潮中受到了“武器的批判”。代之而起的是统一的西汉王朝。我国古代的文化又开始了它生生不息的创造力。

汉初，吸取秦亡的教训，革除秦朝的苛政，“破觚而为圆，斲雕而为朴”（《史记·酷吏列传》），实行休养生息，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秩序，恢复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省法令妨吏者，除挟书律”（《汉书·惠帝

纪》)。吕后元年(前187年)又“除三族罪、妖言令”(《汉书·高后纪》)。因此,当时思想统治的纽带比较松弛。

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回光一忽”,起了实际政治指导作用。代表这种思想的基本著作是《老子》和《黄老帛书》(长沙马王堆1972年汉墓出土)。黄老学说的特点是:在政治上肯定新的封建一统王朝的统治秩序,承认君臣关系不可改变的前提下,极力主张“无为而治”,缓和社会矛盾,稳定新建立的汉政权,这就给统治阶层眼前展现了一个美妙的前景。在战事平息,痛定思痛,寻求长治久安之术时,黄老思想自然会受到布衣将相们的衷心欢迎,狂热的崇拜,从而使这个思想流派取得优势,它的声誉在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中达到了高峰。

当此之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活跃,不仅黄老学说,而且儒、法等诸子百家在不同程度上又相继复活起来,打破了秦代定法家为一尊的局面,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不能与先秦姿态万千的学术流派相比。你看,秦时失意的儒家学说,开始崭露头角,或向学术文化方面发展;昔日显赫一时的法家学说,在政治上碰了钉子之后,并没有悲观消极,也未停步不前,更没有销声匿迹,往往受到讲求实效的政治家的喜好。正是在这种基础上,议论争辩之风相当盛行,形成了继先秦之后学术界再度活跃的局面。一些文士继承战国游士的遗风,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关心国家政治得失,总结历史经验,探寻“文武并用”,长治久安之策。卓绝一代的思想家、文学家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和晁错的《言守边备塞疏》、《论贵粟疏》等都是典型的代表。他们不顾忌讳,慷慨陈辞,揭发时弊,提出解决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不失为诸子散文一种传流作风的继续和发展。

耐人寻味的是,汉文化仍然具有多源性的特点。它在政治、经济、法律、朝仪和宗庙礼仪等方面,承袭了秦制,而在指导思想以及文学艺术的主要方面,却不同于先秦北国,而是从楚文化

中得到滋养的。如果在秦朝多源的文化中，占据正统地位的是中原文化和齐鲁文化，而“好巫信鬼”的荆楚文化，只是侧系旁支，那么汉文化主要是继承了楚文化与齐鲁文化。

楚文化在汉文化形成中地位的重要，与楚文化自身的成就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当时奉行的黄老之学起于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学，高素无比的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湖北随县出土的八种一百二十四件精美乐器；宋玉在辞赋中描写的《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等乐曲的演唱，都是在具有悠久历史与优秀文化传统的楚国的土壤上培育出来的。楚文化水平之高，影响之广，并不因国亡而告绝。秦朝的禁令，秦汉之际的动乱，所造成的只是学术文化波浪发展中的低潮，并没有真正截断楚文化的传流。

汉初，君臣多以楚人为主干，为楚文化的传流，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汉高祖刘邦酷爱楚歌、楚舞，楚汉相争的决战时刻，他用“四面楚歌”向敌项羽展开心理攻势。由此可以想象，汉军士卒，亦会热爱楚歌，会唱也会创作。刘邦虽不是文学家，当其击败项羽，衣锦荣归时，却能引吭高唱“大风起兮云飞扬……”抒发激昂慷慨的感情。这《大风歌》也是楚声。他的宠妾戚夫人善楚歌楚舞，汉宫廷中楚声作指导，“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鲁迅《汉文学史纲》）。马王堆出土的彩绘帛画，天上、人间、地下，……龙的蟠屈飞腾，骑兽的奔跃，鹤的飞鸣，以及巨人托顶，主仆虔诚，明显地绘着楚人信鬼的印记，使人很自然地想起《楚辞》中《招魂》等篇章中的天上、人间和幽都的险怪现象，二者颇有类似之处，从中也可以探索其内在的思想联系。就是汉文学的正宗——汉赋，从文体源流上来说，也是“兴楚而盛汉”，从《楚辞》繁衍派生的。正如刘勰所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贾谊《吊屈原赋》，形式上一傍骚体，精神上也是同屈原混通的。及至枚乘《七发》，方完成了散体大赋的体制，

与《楚辞》分歧异派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与楚文化是一脉相承，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明显的传承性和连续性，这是秦汉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也是汉初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

正因为楚文化在汉文化形成过程中，占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李泽厚：《美的历程》）。毋庸讳言，这个结论有值得商榷之处，不过，这个观点还是给我们很重要的启发。

至于齐鲁文化在汉文化中的影响仍是不可低估的。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和社会意识影响深远的经学，来自齐鲁文化。汉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这阴阳五行说，也是齐人的发明。汉代流行的神仙之术，发源于齐。汉代所崇敬的神，大部分是齐神。齐文化除了富于综合的特色，又具有浪漫色彩。

亚的丝绸之路。奔驰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的各国使者和商队，络绎不绝。他们穿过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西北流沙，飞越满布高山险谷、终年积雪的中亚雪岭，长期地交流着物产、传播文化，传达着友谊的讯息，他们把中国的丝绸、文化艺术，带到了中亚细亚，甚至北非和古罗马，同时异国的礼俗、音乐、杂技，也跟着驼群的足迹，注入中土，使汉文化鲜花繁集，灿烂夺目。

在这些文化交流中，音乐、杂技艺术最为活跃，首先引起人们的关注，受到汉武帝的重视成为最早的两束礼花。异域的箜篌、箏、瑟、琵琶之类的乐器，《鼓吹》、《饶歌》、《摩诃兜勒》等乐曲，“吞刀吐火”、“屠人截马”、“自缚自解”等幻术，以及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边地雄豪班壹所创立的军乐，也纷纷进入汉廷的乐坛、艺苑。多源的汉文化，又吸收了各不同民族文化的精华，使其成为一个包容各种文化的复合体。经过这空前的南北文化大融合，中外文化大交流，使汉文化进入了一个极其光辉灿烂时期，并以它那独特的文化艺术翘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

然而汉文化的长河，经过千回百转，到了东汉，又有佛教文化的支流，汇入它的巨川之中。

尽管佛教的教义，曾迷惑着虔诚焚修的男女信徒，也曾迷惑了一些穷苦无告的劳动人民。但伴随着佛教的东来，西方文化，特别是印度文化，如文学、音韵、音乐、舞蹈、杂技、绘画、雕塑，以及医学、天文等，也同时传入中土，为多源的汉文化提供了丰沛的水源。佛经中的神怪故事，与社会上流传的神仙传说，相互渗透，互相融合，孕育出了六朝的志怪小说。演说佛经故事的俗文、变文，有长行和偈语，可以咏唱，给中国推演出弹词平话，这又是中国通俗文学受佛教影响的吉光片羽。梵文的发音和拼法的传入，对汉代学者创造汉语“切音”，也有启迪作用。汉语中的“浮屠”（即佛）、“桑门”（即和尚）、“伊蒲塞”（即居士）等词汇，也是从梵文中“进口”。可见，远在汉代，汉语与印度以及古代西南亚的语言文字，结下了

亲密的姻缘。至于牟子《理感论》中的“佛象石”、四川等地出土的陶佛、杂技中的“舞象”、“水人弄蛇”（见张衡《西京赋》）等艺术，倘若追踪它的源头，无一例外地都要上溯到汉代佛教文化这块“圣地”。

汉代的艺术家们，不仅大胆地、囫圇吞枣式地引进西方艺术，而且从西方文化中吸取营养，获得创作的灵感，借助中国古代神话提供的多彩多姿的艺术形象，创造出了一系列新的艺术作品。其中常为人忽视而实际颇具特色的是女娲在汉画中形象的变化。女娲是中国神话系统中一位创世之神，是人类的始祖神，同时视为人死后的保护神，因此在汉画中是较为普遍的题材，于汉墓中经常出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和南阳石刻画像，以及沂南古墓画像中，还有王逸的《楚辞·天问》注中，女娲均是“人首蛇身”或人首蛇身交尾象，似乎在翩翩起舞。画面上还有带翼的怪神，飘然欲飞，姿态活泼，栩栩生动。一望便知此画不是中国古典艺术传统，或者是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或者是希腊艺术在中国的变体。

此外，如四川雅安县发现的高颐墓前的立体双翼石狮子（公元209年即献帝建安十四年造）等文物，从内容到形象，都明显地反映出汉代雕刻艺术，受西方艺术风格的影响。

西方艺术的影响，在汉代仅仅是一个开端，及至魏晋南北朝，经过中国艺术家的进一步发挥创造，从而塑造出了一系列光辉灿烂的艺术明珠，把我国古典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随着汉帝国经济繁荣，文化的融合，人才的辈出，承上启下，总结文化学术，整理先秦文化典籍，是汉文化第三个显著特点。

汉代哲学家以其雄浑的气魄和阔大的模式，结束了先秦百家争鸣、诸子蜂起的局面。殊途同归，百川归海，以更高的形态，融合吸收先秦各派思想于自己的体系之中，从而为中国哲学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方向。例如被“定于一尊”的儒学，已非